

# 1947年魏德迈使华与美国 对华政策的转变

杨婉蓉

1947年，伴随着马歇尔调停失败和国共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美国彻底抛开了“中立”的姿态，把有条件的援蒋、阻止中共统治中国作为对华政策的目标。为配合这一政策的转变，魏德迈奉命率团对中国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考察。这是继马歇尔调停后中美关系中的又一次重大事件，对于美国其后的对华政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学界对战后的美国对华政策研究很深入，其中不少涉及魏德迈来华调查这一阶段；也有国外学者利用魏德迈的档案资料，对其军事思想进行研究；但对1947年魏德迈来华调查这一事件本身，尚缺乏全面深入的研究。<sup>①</sup> 本文试图对魏德迈来华调查的前因后果进行详细的梳理，从而揭示1947年后美国对华政策由“中立”转向有条件援助国民党的深层次原因和影响。

---

① 已有的研究主要包括：李黎明、祝国红：《魏德迈来华“调查”及其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唐都学刊》2005年第4期；Keith E. Eiler：《魏德迈论战争与和平》，王晓寒、翟国瑾译，台北，正中书局，1989。涉及这一事件的著述很多，例如资中筠的《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等等。

1947年中，中国内战形势经历了一个重要的战略转折，国民党军队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战场上的溃势驱使国民党政府发起新的求援攻势。6月18日，蒋介石亲自出马，约见司徒雷登，向他通报了东北战局的危急形势。同时，顾维钧在华盛顿会晤负责经济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索普，要求延长1946年拨出的5亿美元贷款的付款期，此外至少再提供2亿美元的贷款。他还要求美国发表支持国民党政府的正式声明。6月25日，顾维钧又会见马歇尔本人，递交求援照会。他还频频走访国会议员进行游说。与国民党政权里应外合的美国亲蒋势力也加紧了活动。在他们控制的报刊上要求援蒋的声浪越来越高。院外援华集团核心人物之一、出版商卢斯利用他控制的舆论阵地攻击范宣德，向马歇尔施加压力。《时代》周刊甚至提出了这样的疑问：“马歇尔对他所面临的巨大任务来说称职吗？”<sup>①</sup>

在美国对欧关系方面，从1947年3月提出杜鲁门主义以来，4、5月国会通过了援助希腊、土耳其的方案，杜鲁门随即签署使之成为法律，对两国大规模援助即将开始。5、6月间，艾奇逊、马歇尔又相继发表对外政策演说，表示美国将以贷款和赠与的方式帮助应付欧洲危机，重建欧洲。美国立即着手帮助西欧各国制订一项复兴经济的计划。这样，美国的对欧和对华关系就形成了一种鲜明对照：一方面肆无忌惮，咄咄逼人，另一方面进退维谷，左右为难。马歇尔自己在6月26日的国务院、陆、海军部联席会议上也坦白承认，他在对华政策方面“确实进退两难”。<sup>②</sup>面对

① W. A. Swanberg, *Luce and His Empire*, New York, 1972, p. 266.

②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 1947. Vol. VII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73, p. 850.

蒋介石集团迫不及待地要美国改变对华政策、对其进行公开而全面的援助的请求，以马歇尔为首的国务院人士对此却顾虑重重、犹豫不决。他们认为：

第一，1947年是冷战加剧和美苏关系全面紧张的一年。由于欧洲的战略重要性和遏制共产主义的需要，美国必须把重点放在欧洲，按照“欧洲第一、亚洲第二”的原则安排自己的全球战略。从这一战略出发，美国在考虑对外援助时必然首先考虑欧洲，对战后“经历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惊人发展”之欧洲形势“采取紧急而专注的行动”。因此，在美国政府全力考虑援助欧洲问题的时候，再要去实施大规模的援华计划，显然没有充足理由。<sup>①</sup>

第二，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各方面都在加速恶化，既失去了人心，又不图改革进取，在此情势下对它实行援助很难达到预期目的。

第三，对蒋介石政府实行大规模的援助，特别是在涉及中国的内政和一些具体做法上予以指导，很容易使美国陷入中国的内部事务而不能自拔，从而增加更多的承诺。如此不仅会遭到中国人民的反对，也会在美国国内一些人士中引起抱怨情绪，“同时还有可能受到其他大国的敌视和报复，甚至危及到我们在世界其他地区承担义务的能力”。<sup>②</sup>

与国务院人士的犹豫不决相反，美国国会中的“中国帮”则掀起了一场要求扩大对蒋援助的浪潮：参议员威廉·诺兰、斯太尔斯·布里奇斯、欧文·布鲁斯特、帕特·麦卡伦和肯尼思·惠里等人攻击杜鲁门政府援蒋不力，对共产主义心慈手软。与此同时，众议员理查德·尼克松和乔治·唐德罗等也“不停地为

①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第405页。

② 《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程宗家译，北京出版社，1982，第175页。

蒋介石摇唇鼓舌”。<sup>①</sup>尤其是众议员沃尔特·周以德，对美国政府进行了“最持续不断的批评”，周以德“经常性地往《国会记录》中塞入他个人关于中国需要更多的援助的意见和同情的言论，以及支持他的观点的选民来信和杂志报纸上力主援华的文章”。在亲蒋派议员的援蒋声浪中，美国军方，参谋长联席会议、陆军部长帕特森、海军部长福莱特等也坚持认为，为了防止国民党政府的垮台，“使其能有效抵抗共产主义在中国扩张”，美国必须下决心“尽早进行援助，包括军事援助”。<sup>②</sup>

同时，“院外援华集团”也在积极活动，争取美援。“院外援华集团”的人员组成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国民党在美人员，主要有宋子文、孔祥熙、陈之迈、皮宗瀚、俞国华、李惟果等，宋美龄也于1948年底亲自赴美进行求援活动；另一部分是同中国问题有传统联系的美国人。主要有：工商界的科尔伯格、雷诺兹，军界的陈纳德、库克、麦克阿瑟，新闻界的卢斯、赫斯特，宗教界的周以德（他本人即是国会议员），以及右翼政客布立特、杜威等。他们还成立了诸如“美国对华政策协会”、“中国应变委员会”、“援助反共中国以保卫美国委员会”等院外亲蒋反共组织。这些人及组织都与国民党政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的切身利益与这个政权的成败密切相关。比如科尔伯格是靠经营中国纺织品发迹的；卢斯在战时就利用其控制的在美国极有影响的《时代》、《生活》等杂志塑造蒋介石的“英雄形象”，他把蒋介石的危机视为他一生最宏大计划的危机。卢斯除利用其所办刊物宣传其观点外，与共和党参议员范登堡关系密切，在有关中国问题上常对范登堡施加影响。<sup>③</sup>陈纳德的航空公司与国民

① 迈克尔·谢勒：《二十世纪的美国与中国》，徐泽荣译，三联书店，1985，第165页。

② *FRUS, 1947, Vol VII, pp. 800-802, 838-848.*

③ Ross Y Keon, *The China Lobby in American Politics*, Harper & Row, New York, 1974, p. 89.

党上层官员勾结从事军火走私活动，连美国驻沪领事鲁特福德也说：“在好战的反共主义的外衣下，隐藏着自私利益和个人发财的真实动机。”与杜鲁门政府大战略的“欧洲第一”构想唱反调，他们主张“亚洲第一”，实际上就是要扶植蒋政权，防止它的倒台危及自己的利益。

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在对华政策问题上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和主张，使得作为决策人的杜鲁门和马歇尔感到左右为难，进退维谷。考虑再三，他们决定派曾经担任过中国战区参谋长和驻华美军司令的魏德迈来中国进行一次“了解事实”的旅行，并就对华政策问题提出建议，以作为他们决策的依据。

## 二

魏德迈（Albert Coady Wedemeyer），1896年生于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城，1918年毕业于西点军校。1929年，他第一次来华，以中尉军衔服务于驻津美军第十五步兵团。当时，他不但学习中国语言，还从事研究中国的经济、文化、社会问题。1931年调至菲律宾。1936~1938年，在德国陆军大学学习军事参谋期间，他因撰写一份作战报告受到时任陆军参谋本部副参谋长马歇尔的赏识，直至成为马歇尔的重要幕僚。1941年，调入陆军参谋部作战计划处，任联合战略委员会委员。后任东南亚战区司令部助理参谋长。1944年10月30日，再度来华，在重庆接替史迪威，任中国战区司令部参谋长，兼驻华美军总司令。除策划、指挥作战外，同时帮助国民党训练与装备了大批美式海陆空军，如新一军、新六军等。同年12月，蒋介石同意了他提出的中美联合部队在天津登陆计划，以美国海军陆战队一个军团和中国五个军，在美国海空军协力下进攻占据华北地区的日本军队，摧毁北平、天津、河北伪政府，隔断了华中与东北日军的联系。1945年升为中将后，他向美国政府提出了由美、英、苏三

国“托管”东北，支持蒋介石稳定华北的建议。同年11月6日，魏德迈第三次来华，在北平逗留了短暂的48个小时。当时，在下榻的北京饭店招待记者时，他曾说：“中国在与敌人作战期间贡献甚大，中国陆军对联合国的胜利，功绩殊伟！今日亟待解决的问题很多，希望中国自行解决，如是方能确立远东和平。”<sup>①</sup>

1947年7月1日，马歇尔向刚从欧洲考察回来的魏德迈提出，要派他到中国 and 朝鲜进行一次“了解事实”的旅行，以此作为制定远东政策的基础。由于军方与国务院在援华问题上一直有不同意见，马歇尔自称：“情况确是危急，我感到有迫切需要重新考虑我们的政策，看看我们继续对华采取的行动应有什么改变。”<sup>②</sup>

魏德迈一向主张积极援蒋反共，一年前曾与马歇尔在和谈问题上有不同意见，马歇尔曾临时建议收回对他的任命而让司徒雷登任驻华大使。现在尽管司徒雷登和驻华使馆从中国报回的情况不厌其详，国务院对中国的情况也了如指掌，却还要再派魏德迈去“了解事实”，这实际上意味着马歇尔有意改变美国政策的侧重点。特别是，马歇尔还征求了魏德迈的意见，问他是否愿意接替司徒雷登任驻华大使，魏德迈因对前事不能释然，予以拒绝，然后马歇尔才请他接受这一临时任务。当魏德迈问马歇尔，美国政府和驻华使馆还有什么掌握不了的情况需要他去发现时，马歇尔解释说，由于国会人士不断抨击政府对中国采取消极政策，因此需要重新评估对华政策。<sup>③</sup>

由此看来，魏德迈使华的目的与其说是为进一步了解情况，不如说是一方面为应付国会中的亲蒋派，一方面为公开改变

① 1947年8月1日《华北日报》。

② *FRUS, 1947 Vol. VII*, p. 633.

③ *Wedemeyer, Wedemeyer Reports!* Henry Holt & Company, New York, 1958, pp. 382 - 383.

“不介入内战”的姿态找台阶下。可以说，对马歇尔来说，司徒雷登和魏德迈是两张牌，要“促和”时打司徒雷登，要助战时就打魏德迈。有意思的是，前一次派司徒雷登时引起魏德迈的不快，这一次派魏德迈引起司徒雷登的不快。当时美国驻华使馆和魏德迈本人都理解马歇尔这一决定标志着美国对华政策开始发生重要转变。<sup>①</sup>

另外，派魏德迈使华也有为国民党打气之意。如《白皮书》叙述这件事的背景时说：“中国政府似无能或不愿采取有效措施来解决摆在它面前的严重问题，而有一种冷漠、失败主义和精神破产的感觉”，“在心理上完全依赖外援”，而认识不到“自助自救……乃是唯一的和基本的要求”。有鉴于此，美国政府才派魏德迈使华。这一说法<sup>②</sup>和魏德迈在华时一再批评蒋政府的调子是一致的。

7月11日公布的杜鲁门给魏德迈的训令指示魏德迈：“在与中国居负责地位的官员和领袖们讨论时，你要说明……只有中国政府能够提出令人满意的证据，证明其能采取导致中国元气恢复的有效措施，美国政府才能考虑对这一项计划提供援助。再则，任何可能使用的援助，必须受美国政府代表的监督”。训令还要魏德迈在中国时先不要就援助问题对国民党作出承诺，而在调查报告中对援助的性质和程度作出建议，并对给予或不给予援助可能产生的后果均作出估计。<sup>③</sup>从训令的内容来看，“有条件的援助”基本方针已定。魏德迈就自己的任务向马歇尔提交的意见书中自以为回天有术，抱着按美国的意图、用美国的力量全盘改造国民党政府的野心勃勃的计划来到了中国。

① John F. Melby, *The Mandate of Heaven: Record of a Civil War, 1945 - 1949*,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Toronto, p. 222.

②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300页。

③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301-302页。

作为政策的另一部分——反对中国共产党，此时也已明确。魏德迈于7月12日向其率领的使团全体成员制定的有关此次任务的方针中提到：“本国不过问涉及国民政府与共产党分子联合之问题（在中国、朝鲜或世界其它地区产生对建立极权主义或共产主义意识之政府有利的条件，均与美国之政策与目标不相符）。”<sup>①</sup>7月14日，魏德迈一行在听取国务院关于中国的情况汇报会上，魏德迈再次追问，美国要求国民党扩大政府的基础，是否应把中共包括在内，范宣德明确答复“不包括中共”。说明连范宣德的态度也已转变。<sup>②</sup>此时美国已明确反对中国成立联合政府。

### 三

为完成调查任务，魏德迈接到命令后于7月16日召集一批专家和顾问，组织了一个由陆军部3人、海军部1人、财政部1人、国务院2人和1名新闻及公共事务顾问组成的9人使团。魏德迈以总统特别代表的身份担任使团的团长。魏德迈一行于1947年7月22日至8月24日在中国考察了一个月。在这期间，他们先后到了南京、北京、天津、沈阳、抚顺、青岛、台湾等地，分头进行了繁忙紧张的活动，自称接触了政府内外广泛的各阶层人士，使团新闻顾问华德森向记者表示，使团此次来华主要是尽量全面地收集各方意见，无论资料来自官方还是民间，使团同样重视。<sup>③</sup>

国民党政府把魏德迈使华看做美国大规模援蒋的先兆。因此，虽然它对美国未经事先商量就宣布使团的消息感到不快，但仍对使团表示热烈欢迎。有人甚至希望魏德迈取代司徒雷登出任大使，

① *FRUS, 1947, Vol. VII, p. 642.*

② *FRUS, 1947, Vol. VII, p. 648.*

③ 1947年8月1日《华北日报》。

须知赫尔利就是这样取代高思的。正因为这样，他们一方面对魏德迈百般逢迎，硬着头皮听他的训斥和指责，一方面提出各种各样的援助要求。魏德迈基于所奉的指令，没有承诺这些要求。

魏德迈使团收集了大量的、极为详尽的材料和数据。以北平为例，除了政府人员外，魏德迈还接见了以文化、教育及经济界人士为主的北平各界名流。其中有北大校长胡适，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校务长窦威廉，美国公理会主席白鲁牧师，冀北电力公司总经理鲍国宝，华北钢铁厂整理委员会陈大绶，资源委员会平津办事处主任马师亮，北水泥公司经理陆继贤，前内务总理孙丹林，民主社会党党员梁秋水等人。谈话内容涉及美国的对华政策以及中国的民生问题等。梁秋水曾向记者表示“魏特使很希望与中国公正人士会晤，以听取广大中国人民的意见，而不是某部分人的意见”。魏使团在北平共历3日，接到各方意见书2000余件，可分为政治、经济、军事及文化四方面内容，并分为急、缓两大类，由使团各位顾问处理，中文的资料则由专人翻译。<sup>①</sup>

魏德迈写给华盛顿的报告都是说中国情况恶化，但无人能拿出办法来。他感到“中国国民党人在精神上已瓦解……国民党士兵……根本不愿打仗。他们的反应越来越冷漠而无效能”。而“另一方面，我们收到的报告说明共产党的队伍精神极佳……他们的领导人，或者还有许多普通成员都相信他们的事业”。<sup>②</sup>针对这种情况，魏德迈感到有必要利用他的特殊地位对国民党政府予以“鞭策”。他自认为来华调查有双重任务：“说服中国人，他们必须证明美国援助不会白费；说服华盛顿，这一援助一定得给。”<sup>③</sup>但是在后一点，他奉命在中国不能作出承

① 《外交部驻平津特派员公署全宗》，天津市档案馆：J10-1-93。

② *FRUS, 1947*, Vol. VII, pp. 682-684.

③ *Wedemeyer, Wedemeyer Reports!* Henry Holt & Company, p. 388.

诺，只能回华盛顿去谈。于是，在中国期间，他主要在前一点上下工夫。为此，他不仅在非公开场合，而且还在公开的场合对国民党政府进行了严厉的训斥。8月22日，他在应邀出席国民党政府的“国务会议”时发表演说，历数其军队、政府、经济生活等方面的种种弊端：贪污腐化、秘密警察横行、滥用刑罚、滥捕滥杀等等。两天之后，魏德迈在其离华声明中再次批评了国民党的“麻木与怠惰”，到处充满“卑屈的失败主义”，并指责他们“并不设法解决当前的问题，而是把很多精力消耗于责难外在的影响和寻求外来的协助”。在严厉批评的同时，魏德迈还极力敦促国民党政府实行战后以来美国所一直期待的“改革”。他说，“徒有军事力量不能消灭共产主义”，“为了恢复及维持人民的信任，中央政府必得立即施行彻底的深远的政治和经济改革”。他还强调：“中央政府在共产党猛攻之下，能否屹立或倒台，将决定于这种政治与经济状况改进的效率与时机。”<sup>①</sup>

国民党方面对这样一项声明当然十分不快。特别是声明公开提出，中国的恢复“有待于令人振奋的领导”，引起蒋介石的敏感，他在魏德迈离华的次日即召见司徒雷登的秘书傅泾波，详细询问魏德迈使华的背景，探听美国是否有意逼他退休或用其他办法要他去职。<sup>②</sup>当然，蒋介石集团最大的不快还在于魏德迈并没有立即允诺给予大量援助。由于魏德迈必须遵守在华期间不做承诺的训令，蒋方也就无从知道他已下决心回美国向政府建议给予积极援助。魏德迈后来说，他原以为他回国后不久，他的报告就会发表，才决定在华期间公开批评国民党的，早知道他的报告会被马歇尔压下，他就不会这样做了。<sup>③</sup>

①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763页。

②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826页。

③ Wedemeyer, *Wedemeyer Reports!*, Henry Holt & Company, pp. 390 - 391.

#### 四

魏德迈及其使团回国后，在9月19日给杜鲁门的长篇报告中提出了一个全面援蒋的计划。他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来估量中国的战略意义，认为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是太重要了，不能冒险让其落入共产党之手。他写道，在战时，一个友好的中国能向美国提供“重要空军基地作为轰炸前站之用”，并能提供亚洲沿海的重要海军基地，以及巨大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反之，如果中国被苏联或“一个亲苏的政权”所控制，中国将向美国的敌人提供这些资源，从而危及美国在日本、琉球和菲律宾的基地的效能。他虽然也认为国民党政府必须实行改革，但不同意国务院官员以改革作为援助前提的主张。他建议立即着手，给国民党政府以长期的、大规模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并主张派遣大量美国顾问指导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部和其他经济部门，强化军事顾问团，把它的活动范围扩大到后勤部队、训练营和战场的军事行动。<sup>①</sup>

报告分析了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形势和社会文化状况，以及国民党政府全面而深刻的危机，指出：为了美国的战略利益，绝不能听任中国局势的恶化，而必须采取“积极的办法”和“迅速的行动”。从这一观点出发，报告建议美国政府继续并扩大其援助国民党政府的政策，至少在5年之内应给予军事的和经济的援助，但应基于以下几个条件：“（一）中国（国民党政府）将其要求援助的请求告知联合国；（二）中国要求联合国促成满洲置于五强的监护或托管之下；（三）中国应利用其本国的资源，改革其财政、政府与军队，并在经济与军事方面延用美国顾问人员。”<sup>②</sup>除此之外，报告还就美援的总体计划、目标、范

<sup>①</sup> Wedemeyer, *Wedemeyer Reports!* Henry Holt & Company, pp. 392.

<sup>②</sup> Wedemeyer, *Wedemeyer Reports!* Henry Holt & Company, pp. 382-383, 395.

围、程度和具体项目，以及应采取的方式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设想。

魏德迈认为国民党统治由于其“领导权的反动本质、它的统治的高压性质和文武官员中普遍的腐败，从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和支持而言，使政府受严重的损失。现在普遍相信，从目前情况下，除非国民党政府厉行改革，它将经缓慢逐渐的过程而告瓦解”。针对中国情况，魏德迈提出了若干项政治改革措施，即“把国民党从政府中完全分出，使蒋委员长成为国家领袖而非党的领袖；改组国民政府，包括行政院和国府委员会的改组，使负责任的人士不分党派可以参加；在政府中，划清职责以增进效率，培养主动性，防止政府的事务及政策为一人所独揽，鼓励能干及进步而现在不愿在政府中服务的人士进入政府工作；加强监察院以实行罢免及惩罚贪官污吏；废止现存的秘密警察制度，停止由军事机关逮捕平民；迅速公开审讯被捕之人，并充分实行人身保护的权力；停止对教员学生施用武力及威胁，对纯由政见关系而被解聘或开除的教授与学生予以复职复学；实行土地改革计划，以减轻农民高利贷和租税的负担，并供给他们土地；分散政府的权力使能有更高度的地方自治和地方人士参与行政；免去现役军人在政府中的文职；公布关于财政政策及其实施的全部报告以及政府收支详细资料，其中包括全国、省、市预算的报告”。<sup>①</sup>

对于中国战后的经济现状，魏德迈认为，由于连年战争的影响，中国经济已到了崩溃边缘，其工业、农业、贸易、财政金融等方面均面临严重危机。魏德迈给出的改革措施是：（1）中国首先应力谋恢复政府的财政收支平衡，以求稳定通货。“除非政府业已采取量入为出的办法，任何以发行新币稳定通货的计划，不论是纸币也好，银币也好，都是不成熟的。最后的目标，在于限制通货流通数量和向中央银行借款。中央银行管理法币发行的

<sup>①</sup>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790页。

情况，应该详细公布，这些办法可能减缓物价上涨的速度，保全法币作为国家货币的地位，以及阻止各省当局发行地方货币的任何企图”。(2) 改进经济状况，促进生产。“用公开而诚实的方法，把政府所有的在大陆上以及在台湾的工厂和专卖事业，拍卖给出价——最好是外汇或黄金——最高的人，可以改进经济状况，这种办法可以发生一种目前所缺乏的刺激，因而促进生产。出卖工厂以后，可以减去国家预算中津贴政府企业的支出，减少假公济私的职员数目，使政府预算获得大量财源，并能有助于抑制物价的上涨。禁止官员担任私营企业的董事也可以加强公务员纪律”。(3) 增加政府收入，走向预算平衡。“利用以上的办法，与由捐税和公债以增加收入，走向预算平衡是可能的，就是在现行税法之下，严格而正确地执行，仍然可能增加收入，商品投机利得税是可以增加的一项新税，假如稳定物价和限制货币发行具有成功的希望，当可鼓励人民购买政府公债，和收回逃往国外的资金，这样可以大有助于政府平衡预算，改进田赋征实的效率，可以增加收入，并能减轻负担，如果田赋征实和征兵的负担过重，则政府在农村的地位，就要很快地降低，厘金——地方通过税——的复活，和军人以徒有其名的价格从事征发都应当严加限制”。<sup>①</sup>

军事方面，魏德迈认为，当前的军事情势是：共产党军队在满洲、山东及河北获得了军事上的成功，主要是由于他们“打了就走”的游击战法优于国民党军以防守为主的战略；同时由于国民党军高级指挥当局的措施失当与无能，国民党交通线的缩短，国民党陆空军装备和补给的普遍折耗及空竭，来自南方军队与当地居民脱节，致使共产党获得胜利。美国对华有条件的军事援助的目的应为促成国民党军队的改组，重新获得群众对军队的信

<sup>①</sup>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811~812页。

任，确保国民党军能有效地抵抗共产党军队的进攻，并建立中国稳定的局面。这种援助当适合于促成一个政权的出现，而该政权当沿着美国认为满意的方向发展，同时起到阻止黠武的共产主义逐渐伸张的作用。对华军事援助主要通过物资的援助、顾问的援助或由美国人员直接参加作战三种方式，最后一种因有悖于美国现行对华政策故不能采取。无论何种方式，中国应首先请求美国援助，并将所采步骤通知联合国。<sup>①</sup>

## 五

从实质上讲，魏德迈的调查报告是一个“有条件援蒋”的方案。该报告一提出，杜鲁门和马歇尔即认为其中要求联合国干预中国事务，特别是将东北托管的建议如透露出去，必将遭到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强烈反对，对美国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因此下令将它列为绝密件保存起来。但是，由于亲蒋派的压力，有关魏德迈报告的主要内容在被删去上述两条建议之后，仍在美国政府和国会中传阅开来，并且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魏德迈报告的最大“贡献”就是使美国统治集团在是否继续援蒋的问题上取得了暂时的一致，进而确定了“有条件援蒋”的方针。报告从对抗前苏联的总战略需要，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的“危害性”和美、蒋的共同利害关系等方面论述了对蒋援助的必要性，指出：研究中国问题必须首先考虑对付苏联，在目前情况下停止对华援助，“也就是等于使中国政府失去根据地”，其结果，必然导致满洲沦为前苏联的“仆从”和“一个共产党统治的中国”，而“一个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对美国利益是有害的”。报告说，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将“降低美国在远东

<sup>①</sup>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824页。

的威望，并会使苏联势力的伸张和政治扩张不只是在亚洲，而且在世界其他地区都更为容易”。<sup>①</sup>更重要的是，“在战时要是存在着一个不友好的中国，将使我们不能得到重要的空军基地作为轰炸前站之用和不能沿亚洲海岸拥有重要海军基地”。在谈到对蒋实行援助的“好处”时，报告则说：“一个援助计划，如果有效执行起来，可以支持对共产主义的扩张的抵抗，且可有助于中国逐渐趋向安定的发展。”在战时，“一个与美国友好或同盟的统一的中国，不但可供给重要的海空军基地，而且从它的幅度与人力来说，也是美国的一个重要盟友”。<sup>②</sup>最后，报告还特别指出，美国和国民党政府之间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对华政策“须顾到八年抗战所给予中国的艰难困苦、反抗共产主义的负担和它为盟国所做的牺牲”。魏德迈的这番宏论，不仅博得了国会中亲蒋分子的一片喝彩，而且也深深地触及了杜鲁门和马歇尔最敏感的神经，使他们不得不承认：“如果美国对中国政府表示全无信心，并且拒绝中国政府关于援助的请求……那是违背美国利益的。”因此，为了“能阻止正在崩溃中的中国经济，使中国政府再有一个机会来稳定中国国内的情势”，他们下决心拟订了一个援蒋方案，于1948年2月18日提交国会。<sup>③</sup>该方案经国会讨论后于4月2日通过，规定在此后一年的时间里，由杜鲁门拨款4.63亿美元援助中国国民党政府，是为“1948年援华法案”。从此，大量的美国贷款和各种物资援助源源不断地流入国民党政府手中，使其在注定要失败的內战赌博中又得到了一批新的“赌本”。

应当指出，按照“有条件援蒋”的方针，美国对蒋介石政

①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782~789页。

②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820~822页。

③ *Facts on File Yearbook—The Index of World Events, Person's Index*, New York: Facts on File. 1947, pp. 357-358.

府的继续援助，是以要求它实行改革，特别是加强对它的监督控制作为交换的。魏德迈调查之后，美国与国民党政府陆续签订了《救济协定》、《海军协定》、《关于经济援助之协定》和《农业协定》等一系列协定。根据这些协定，美国不仅对美援的物资有最高决策权，而且可以和国民党政府共同“协商”贸易政策，共同拟订和监督中国的农业生产、农产品的销售、土地的灌溉和畜牧业、手工业等各项计划；美国军事顾问团的职权，也从训练国民党军事人员扩大到参加蒋介石的国防部工作和作战计划的制订等等。

但是，魏德迈的调查报告没有也不可能解决美国在对华政策上的矛盾，相反，围绕着是否给蒋介石政府以军事援助的问题，美国统治集团内部产生了更加激烈的争论，这一争论在杜鲁门提出援蒋方案之后达到高潮。为此，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举行了一轮接一轮的辩论。在辩论中，国务院人士以魏德迈报告中所暴露的国民党政府的全面危机为根据，坚决反对军事援助。他们认为：“美国如果存心参与中国的军事问题，则必将遭到若干可能的后果”，即直接参战的责任与义务，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强烈反对，人力物力的巨大消耗等等。因此，美国必须避免这种“既困难而又危险”的局面，只能从经济上支援国民党政府。<sup>①</sup>而魏德迈作为一名“持强烈亲华观点的证人”则力主军事援助。他声称，单纯的经济援助是不够的，也是不明智的。<sup>②</sup>国会中的亲蒋派支持其主张，因为“援华方案”与“欧洲复兴计划”是同时讨论的，他们甚至以实行军事援蒋作为投票支持后者的条件。

上述争论表明，魏德迈的报告虽然使美国统治集团在是否援蒋的问题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却未能打消作为决策者的杜鲁门

① *FRUS, 1947, Vol. VII, pp. 1045 - 1054, p. 1085.*

② *Ross Y Keon, The China Lobby in American Politics, pp. 90 - 95.*

等人对于军事援蒋的疑虑，他们无论如何也不愿让美国卷入中国内战太深而跟随蒋介石冒险。在他们的坚持下，美国政府和国会在决定继续援蒋和加强对蒋控制的同时，又想方设法地为自己以后能在国民党最终失败时从中国“脱身”留下了退路。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对蒋采取经济援助的形式而不予以直接的军事援助，避免在中国内战中承担责任和义务。在国会讨论“援华方案”时，亲蒋分子曾经极力主张将4.63亿美元的援蒋总额中的1.5亿美元作为军事援助，并且一度迫使众议院通过了他们的提议。但国会讨论的最后结果，却将这一部分改为“特别赠款”，由国民党政府“自行决定用途”。<sup>①</sup>不仅如此，“1948年援华法案”的序言中还作了如下规定：美国在援华法案下所给予的援助，“不得解释为美国对于中华民国的政策、行为或承诺，或对于中国国内于任何时间所存在的状况，承担任何已经明示或默示的责任”。<sup>②</sup>

第二，把对蒋援助限制在一定数量之内。杜鲁门最初提出的总数是5.7亿美元，国会通过时则改为4.63亿美元，后来，“拨款委员会”又进一步削减为4亿美元。这个数字与国民党政府所要求的10亿美元相比，相去甚远。因此，国民党政府很担心“不足以保证他们夺得胜利”。<sup>③</sup>几次要求新的援助，但均为美国政府所拒绝。

第三，“保持最大限度的行动自由”。尽管美国政府对其对华政策早有说明，并且已经为其以后能从中国“脱身”作了种种或明或暗的准备。但是，到了1948年夏末秋初国共进行的大决战，国民党当局最后失败的迹象越来越明显的时候，司徒雷登

① *FRUS, 1948, Vol. VIII, pp. 142, 287.*

②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428页。

③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133页。

仍感到有必要就如何“应变”的种种问题向华盛顿请示对策。对此，马歇尔答称：“中国的发展显然正在进入一个变动极大和极其混乱的时期，在这个期间，不可能老早就确有把握地、清楚地预见将来要发生的事态”，或“制订出关于我国未来对华政策的任何严密的计划”。因此，美国政府目前最聪明的办法就是：静观待变，“保持最大限度的行动自由”。<sup>①</sup>

总之，魏德迈的调查及其报告，一方面使美国统治者确立了“有条件援蒋”的方针，决定继续对蒋援助，并加强了对蒋政府的控制和监督，另一方面又使美国政府更加不信任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始终不敢对它放手支援，甚至准备在不得已的时候抛弃蒋介石集团，准备从中国“脱身”。这样，美国的对华政策就完全陷入了一种难以自拔的矛盾之中。“1948年援华法案”的通过，标志着美国对华政策自“杜鲁门主义”出台以来，从脱离向援蒋反共转变的最终完成。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考虑始终是飘忽不定。它在战略上的考虑和国内政治上的考虑之间左冲右突，勉为其难。最终，对华政策上的妥协变成了为保证政府更广泛的大战略得以实施而采取的政治上的权宜之计。

## 结 语

二战结束前后，中国最大的现实是国共之争有可能发展成内战。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就是要避免中国内战，促进两党和谈，同时又要尽一切力量维持国民党的统治；而国民党的目标是武力灭共，美国正是其借助的力量。美国的政策一开始就处于不可调和的悖论之中，结果在貌似公允中一步步偏袒国民党，从避战到助战到深陷其中。

1947年魏德迈来华调查是美国政府为其进退维谷的对华政

<sup>①</sup>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322~323页。

策寻找出路的产物。它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解决如何解决如何援蒋的问题，而且主要是为了解决要不要继续援蒋的问题。派出魏德迈使团是马歇尔的缓兵之计。它使美国政府在来自各方面的要求大规模援蒋的压力面前得到一个喘息之机，可以使他暂时避免亲蒋势力的攻击，也可以使他暂时免于承担大规模援蒋的风险。尽管魏德迈的调查堪称尽心尽力，不辞劳苦，而且也的确收集了极其丰富的资料，但是，魏德迈的调查并没有也不可能为美国的对华政策找到出路，而只是使它在既要干涉中国内战，又想免于卷入中国内部事务的自相矛盾的旋涡中越陷越深，无法自拔。

www.cnki.net